

乡村振兴视野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浙省个案^{*1}

杨璐璐

【内容提要】：运用人力资本投资理论，构建影响农民教育行为决策的理论模型，研究影响农民培训满意度的因素。选择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典型模式之一的湖州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在理论设定的教育环境、角色定位、教育条件三大方面的14个因素中，只有农民对其他教育或培育的评价、农民受教育情况、农民对培训后自身能力提高的预期或者结果、对师资质量的满意度，对农民满意度产生显著影响。应以实施重大教育培训项目为抓手，加大职业农民培育力度；以农民需求为导向，着力提升农民职业教育精准性；以加强培训平台建设为抓手，着力提升农民职业教育质量，积极创造良好的培育环境。

【关键词】：新型职业农民；“三农”问题；政府作为

农民是乡村振兴的主体和受益者。乡村振兴的核心是让乡村居民生活富裕起来，特别是让乡村的农业居民富裕起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需要有强大的人才支撑，必须把亿万农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调动起来。当前，“谁来种地”“如何种地”成为推进农业现代化亟待解决的难题。留守在农村的农民，以老年、妇女居多，留守农业人群呈现老龄化、总量相对不足、整体素质偏低、结构不尽合理等问题，关键农时缺人手、现代农业缺人才、新农村建设人力缺乏的问题日显严峻。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2012年国家把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纳入国家解决现代农业人力支撑的系统工程。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在2013年底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述了“谁来种地”的问题，强调要吸引年轻人务农，以培育职业农民为重点，构建职业农民队伍。2016年4月，在安徽小岗村召开的农村改革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要加快构建职业农民队伍，形成一支高素质农业生产经营队伍。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四川代表团审议时提出“就地培养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2012年以来，中央先后在4个省、21个市和487个示范县开展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试点，探索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方法和路径。农业部根据试点经验总结出全国十大职业农民培育典型模式。2017年农业部颁布《“十三五”全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发展规划》。

党的十九大报告把“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纳入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振兴战略的核心是让乡村居民的生活富裕起来，特别是让乡村的农业居民富裕起来，而生活富裕的前提是产业兴旺，这就需要“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推动“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为此，必须充分发挥人才的引领作用，关键是农民要向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转型。农民要学会现代技术与管理方法，树立现代经营理念，提高抵御市场风险能力；要激励更多优秀的城市人才下乡创业，支持和鼓励农民就业创业。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农村现代化”，涉及农村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各方面的建设。高素质农民是“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的前提。因此，加强农村干部、农民和新型主体培训，培养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是乡村振兴的现实要求。

¹ * 该标题为《改革》编辑部改定标题，作者原标题为《农户满意度视域下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浙江省湖州市“农民学院模式”的调查》。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社会治理视域下新中国农地制度沿革与变迁趋势研究”（批准号：16CGL047）。

作者单位：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土地政策研究中心 北京 100083

近年来，新型职业农民培育问题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学术界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必要性和内涵特征有较统一、深入的认识，并不断探索和发现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中存在的问题，研究主要涉及教育培训本身的问题和政府管理体制两大方面。关于培训本身的问题，学者们的观点主要聚焦在教育培训体系与农民、农业实际需求不一致，农民培训缺乏广泛认可和支持，教育培训基础设施落后，师资队伍知识结构老化，资金投入不足、不均或落实不到位等问题上，认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体系和模式需要进一步完善和创新。^{[1][2]}关于管理和制度问题，学者们的观点主要聚焦在缺乏政策支持和立法保障、监管机制不健全、评价体系不完善等问题上。^{[3][4][5][6]}学者从国外经验借鉴^{[7][8][9]}、教育培训体系完善、资金支持机制创新、法律制度保障、关联政策环境支持等视角^{[10][11][12][13][14][15][16]}提出了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具体建议。

已有研究主要采取的是宏观的分析视角，虽然探讨了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中的关键性问题，但是指向性和聚焦不够，导致研究宽泛化、缺乏深度。目前学术界对影响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因素、培育体系的内容尚无深入的研究，也没有达成共识，导致实际培育工作缺乏系统性和规划性。只有采用科学的方法，理清影响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因素，构建影响因素评价指标体系，并且对每个因素进行权重和形态的理论研究，同时与地方实证调查相结合，才能提出可行的培育优化对策，进而增强培育的有效性和针对性。基于此，这里运用人力资本投资理论构建教育环境、角色定位、教育条件对人力资本投资影响的研究框架，从农户满意度视角，对湖州农民学院参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影响因素予以细化分析，并对其影响因素运用有序 Logistic 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挖掘出农民参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内在决策机制，为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的有效推进提供理论基础。

二、研究框架的提出

农民的行为决策直接决定培训的推进和效果。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中，农民作为受培训者、参与者，是培训工作开展的核心。农民是否自愿参与培训，对培训内容是否满意，是否在培训中获得提升，直接影响到培训的效果。而行为人对教育的行为决策选择又是基于利益变化下的策略博弈，因此，有必要探讨哪些因素会影响到行为人的行为决策选择。

（一）教育环境对行为人决策的影响

在人口迁移理论或城市迁移理论中，教育因素的意义已经凸显。由于教育选择性的存在，即在城市里在学校所学的技能更受重视。Todaro 认为，在许多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中，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情绪预期与受教育水平之间存在着正相关的联系。^[17]Arthur 发现，在加纳农村家庭受教育水平是确定其家庭成员向城市迁移的重要标准之一。因为人们相信家庭中具有较高技能的成员更可能在城市的劳动力市场找到工作，那些接受了更高层次教育的家庭的成员无疑是最早从农村向城市迁移的人。^[18]Sahn & Alderman (1998) 指出，在斯里兰卡那些接受了更高层次教育的农村居民最可能向城市迁移。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内部迁移与教育的关系已经超出教育选择性的趋势，一些研究表明，愿意往城市迁移的个人和家庭旨在追求城市中更多和更高质量的教育机会。Lemel (1989) 在土耳其的研究表明，农村居民相信高水平的教育通常会使人受益终生并可以使其找到较好的工作。因为获得高水平教育的机会往往在城市，所以个人和家庭往城市迁移的目的首先是为了获得接受教育的机会，最终目的是为了提高收入。Gugler (1986) 认为，家庭往城市迁移给其家庭成员提供了更多接受教育的机会，目的在于这些教育机会会带来更高的地位和高报酬的工作。由此可见，无论是寻求教育发挥的空间，还是获得优质教育的空间，教育是人口迁移的一个不可避免的因素。教育意义的存在表明人们对教育环境的重视，人们需要一个可以发挥所学技能的平台，也需要更多更好的教育机会，这些都是基于人们对教育效益的认同和教育资源不均的存在，因为人们认为优质教育资源和机会可以带来更多的教育回报（高收入、高地位等），并且高水平教育资源的分布是不均的。只要这两个条件一直存在，教育环境就会对教育效果产生影响。良好的教育环境、更多的教育机会是人们追求的，所以在这样的环境中更容易产生对教育的认同和满足。

（二）角色定位对行为人决策的影响

在教育培训的投资评估理论中，教育经济学家一直在寻找教育投资评估的方法来评估教育投资行为。例如 Henry Levin 的成本-收益分析、Martin Carnoy 的收益率分析，通过收益与成本的分析，评价教育投资在提高生产力和收入水平方面的能力。

从教育培训中获得收益是最终的目的，同时该项活动也会存在私人成本，包括个人在教育上的花费和教育活动期间放弃的收入以及可能造成的负的消费效果。对成本与收益的测量存在各种困难，比如必须努力从统计上控制可能影响收入且与教育有关的非教育方面的差别，但是人们的人力资本投资也会受到主观因素的影响，不同的人对待教育培训的态度是不同的，既有支持也有反对，既有积极参与也有漠不关心，我们可以把这些称为行为人对人力资本投资的角色定位。角色定位的前提是教育培训中的收益率，它通过行为策略刻画了行为主体在教育培训中的成本与收益。因此，角色定位关注的是个体教育培训成本与收益的影响因素，即探讨哪些因素最终影响到个人的收益，进而影响到行为人在教育培训中的态度。在综合这些理论的基础上，这里认为教育培训中角色定位的影响因素可分为三大类：行为人的禀赋特征、行为人的教育需求、教育培训中行为人的效用变化。第一，行为人的禀赋特征是指教育培训中不同行为人的个人特征，如年龄、职业、身份、收入、教育、家庭状况等因素。这些个体禀赋决定了行为人在人力资本投资中的私人教育成本投入与预期收益判断，而这种判断对行为人最终的角色定位具有重要的导向，比如，教育培训的私人成本可能成为家庭，特别是贫困家庭的经济负担。第二，行为人的教育需求。教育需求来自教育培训中私人成本的负担能力和收益的改善能力，私人成本包括参加教育培训而付出的资源的价值和参加教育活动期间放弃的资源价值。私人成本负担可能对教育需求产生负的影响。以经济学的观点来看，一项活动的成本取决于这些必需的资源在最佳方案中的价值，也就是“机会成本”。当行为人认为该项教育是非常重要、急需的，教育培训放弃的机会的价值就会较低，对收益的评估就会较高。第三，行为人的效用变化是指行为人在教育培训中的效用损益变化。基于理性经济人假设行为人追求效用最大化，在教育培训中，若行为人预期效用会增加，那么他们倾向于赞成或支持，反之则会反对或阻挠。这种效用变化一方面受到个人效用函数的影响，这个主要取决于行为人的禀赋特征；另一方面取决于教育培训内容的相关性和对行为人的长期回报。

（三）教育条件对行为人决策的影响

培训必须有经费投入，然而这种投入会导致人力资本投资。关于教育投资的研究，贝克（Becker，1962、1983）把“机会成本”运用到接受学校教育或培训所花费的时间成本分析中，称为放弃的收入。放弃的收入是指收入很低的岗位工作的即时低收入，但根据人力资本理论，人力资本是可迁移的，这种人力资本投资会得到补偿性增值。人们是否承担由培训而放弃收入所造成的全部机会成本，取决于个体能够将这种人力资本应用于其他地方的程度，即取决于所获得技能的迁移性。即收入曲线的梯度越陡和即时收入越低，人们对于培训的投资越大。作为人力资本理论的一个部分，根据迁移性定义的技能在培训中占据核心位置。这种技能的获得和提升对于弥补“机会成本”及其受教育后收入增加至关重要。

可迁移技能的供给来自培训方的教学条件（与教学有关的所有资源条件），学员根据个人的“机会成本”估值和可迁移性估值，对教学条件采取是否接受和满意的评价，进而影响人力资本投资决策。这里认为，教学条件的内容可分为四大类：教育环境与管理、教学安排、师资质量、教材资料。假设支持程度可以刻画行为人的决策行为，可以将教学条件理解为支持程度的指标值（指标越高，说明行为人对培训的支持程度越高，对应教学条件即为赞成或支持）。用P表示支持程度，以教育环境与管理、教学安排、师资质量、教材资料为自变量，可以刻画出一个反映培训中教育条件的函数关系式：

$$P=f(a,b,c,d)$$

其中，P表示支持程度，a表示教学条件中的教育环境与管理，b表示教学条件中的教学安排，c表示教学条件中的师资质量，d表示教学条件中的教材资料。P值越高，行为人对培训的支持度越高，相应地，行为人积极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参与培训；P值较低，意味着行为人对培训不满意，选择不参加。

三、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影响因素理论分析：基于农户满意度视角的解释

按照上文的理论解释，教育环境、行为人角色定位、教育条件会影响到新型职业农民教育中行为主体的行动策略，最终影

响到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的开展和效果。而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是一项服务农民的工作，基层农户对这项工作的支持与推动是决定培训质量的关键，农户满意度是衡量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成败的重要标准。此处从农户满意度的视角出发，对我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影响因素进行描述性分析，并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构建起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影响因素的理论假说。

（一）假说一：参与主体的积极性会受到教育环境的影响而发生改变

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作为一种非强制性再教育，参与主体的积极参与是培育工作开展的前提。从教育环境来看，良好的教育环境和教育资源供给，能够对农民产生视觉和心理刺激，使其产生教育缺乏的焦虑，刺激其主动参加教育培训。良好的教育环境需要政府及相关培训机构共同搭建，政府提供的培育机会和项目越多，将会有更多的优质资源，诸如优质教师、前沿知识、先进技术等向该培育项目集中，农民通过培育可以获得的有效信息就越多，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效果就越好。农民对其他教育培训项目的参与经历会影响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效果，如果农民在进行职业农民培育的同时，也参加了其他教育培训项目，表明其学习的积极性较高、改善的愿望较强烈，对教育培训的重视程度和关切度较高，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拥护度和参与度也较高。此外，农民对其他教育培训的评价越低，表明农民有较高的培训期望或者存在未满足的培训需求，带着这种需求，农民对湖州农民学院的评价也较不容易产生高满意度。政府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办学信息的宣传，会产生价值导向、信息刺激、政策指引和权威带动，刺激农民潜在教育需求或增加对培育效果的认识，增强农民参与培训的积极性。

（二）假说二：农户的角色定位对新型职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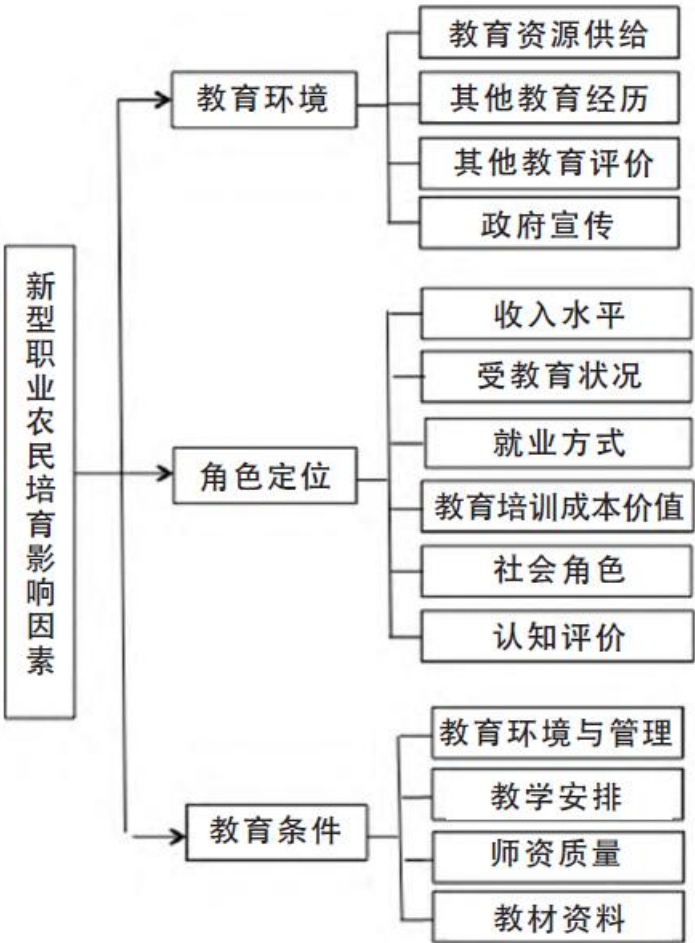
农民培育工程的推进具有显著影响相对于资金补助、制度改革而言，教育培训的效果是隐性的，并且和农民自身对知识的理解、吸收、应用有关。理论上，农民的角色定位会影响其对培育工程的参与和支持。第一，农民的收入水平会直接影响到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态度，较高收入水平的人更容易接受再教育，并且对再教育的渴望程度也越高。第二，农民的受教育状况，即文化程度会影响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育预期效益的认识，相对较高文化程度的人，在长期接受教育的过程中会形成对知识重要性的认知，进而支持、参与教育培训工作；文化程度较低的农户，一般来说会忽略教育的重要性，在学习理解方面也会呈现相对较低的接受和领会能力，对教育培训的认识不足，对预期收益判断较低，参与程度自然不高。第三，农民就业方式会影响剩余时间和对培训所带来预期收益的判断。如果农民的收入主要来自务工，务农收入较少，对职业农民培育重要性的认识就会不足；反之，务农或兼业的就业方式对通过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提高农业生产效益的期望程度就会较高；同时，如果农民的就业方式主要是务工，包括在农场主处务工和到城市务工，不仅务工时间受到限制，并且基于利益最大化的考虑，会充分利用工作时间，剩余闲暇时间较少，当放弃工作进行培训的收益小于成本（务工收益）时，农民不会参与培训。实践中，务工的农民一方面文化程度普遍不高，另一方面农业生产在家庭收入中的比重不高，对他们来说，放弃工作进行培训的成本是很大的，教育培训的潜在农业收益的吸引不足，进而表现出较低的参与积极性。第四，农户参加教育培训私人成本的负担。农民参加职业教育存在时间成本，花费学费、车费的资金成本，还有放弃或耽误农业生产或从事其他生产获得收入的机会成本，因而农民参加职业培训是存在需求条件的，只有农民认为参加培训时这些成本不存在或价值较低，且培训收益价值较高时，才会产生较高的参与积极性和满意度。第五，农户的社会角色会直接影响到对职业农民培育的态度。村干部和年轻人更容易接受当前的农民教育，并会积极参与，产生较高的满意度。第六，农民的认识和预期收益判断是决定农户角色定位的最直接因素。通过培训是否提高或改善了生产经营能力是农民最关心的，也是农民考虑职业教育好坏的重要标准，农民的获得感直接决定农户对培育的评价和态度，或支持、或反对，或参与、或观望，这种评价会产生波及效应，影响日后的行为选择和他人的判断，会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可持续发展产生影响。

（三）假说三：教育条件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影响最直接

教育条件直接决定了教育水平和农民所获得的教育“产品”的质量，进而影响农民的满意度。教育条件包括教育环境与管理、教学安排、师资质量、教材资料。从理论上讲，这四个方面的条件所带来的影响力是不同的。第一，教育情况，诸如时间安排、教学内容、教学形式、学费标准等的影响会最强烈，因为在职业教育培训中，农民放弃工作或闲暇时间参加，是有较强

的目的性和需求性的，对与自身学习目的息息相关的教学内容、时间、学费等会最为关注。第二，师资情况。职业培训时间有限，教学形式主要是教师单方面传授，作为重要的信息获取源，教师的水平、态度和辅导会直接刺激农民的感官，决定农民的满意度。第三，教材是否具有实用性、先进性、针对性，会影响农民对农民学院的满意度，但是相对于教学内容和师资情况，会是次要考虑的。第四，教育环境、组织管理、教学设施、教学服务等环境和管理条件，作为外围服务性保障条件，只能产生“保障”因素，不能没有，但是具备也不会产生激励效果，也就是说，农民不会仅仅因为优美的校园、先进的硬件、优质的服务就参加职业培训。

综上所述，从教育环境来看，教育资源供给、农民对其他教育培训项目的参与经历和评价、政府宣传是影响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主要因素。从行为人角色来看，农民的收入水平、受教育状况、农民就业方式、教育培训中私人成本价值、农户的社会角色、自身认知会直接决定农户的角色定位，进而影响职业农民培育工作的推进和效果。从教育条件来看，教育环境与管理、教学安排、师资质量、教材资料是主要的影响因素。在分析这些影响因素的基础上，构建基于农户满意度视角的农民学院参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影响因素的理论假说和分析框架(见图一)。



图一 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影响因素

四、实证分析：基于湖州“农民学院模式”的调查

基于前文的理论假设，这里基于湖州市新型职业农民职业教育情况的调查数据对其作实证分析，探寻影响农民学院参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关键要素。

（一）样本选择

湖州是全国首个地市级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近年来，按照提前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要求，加快农业结构调整，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取得明显进展。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现代生态循环农业等国家级试点有序推进，农村“三权”改革、农作物秸秆禁烧与综合利用、渔民路上安居工程建设等工作走在了浙江省前列。2014 年被农业部确定为全国首批整市推进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试点，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七位一体”的培育模式被农业部列为全国十大职业农民培育典型模式。自 2010 年 4 月湖州农民学院成立以来，学校积极承接湖州市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与管理工作，累计完成新型职业农民培育 4972 名，认定 4650 人。紧盯高端人才培养，采取与浙江大学合作等方式，开展了“湖州市农业推广人员高级研修班”“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高级研修班”“农村电子商务专修班”等系列特色主题高级研修班，122 人参加培训研修。开展“农民创业大学堂”普训式教育，丰富完善“新型农民创业大讲堂”100 讲课程菜单，根据农民教育需求，在 3 县 2 区累计开展讲座 150 多讲，受惠人次达 7000 多人。

（二）数据来源和说明

选择 2016 年 9 月和 10 月培训并获得证书的新型职业农民为研究对象。通过整群分层抽样的方法选取农民调研样本：按照花卉苗木、水产、蔬菜、水果、休闲观光五个培训产业，选取 11 个乡镇作为样本采集区，每个产业选择了 2~3 个典型乡镇。就农户情况、职业农民教育情况、其他教育或培训情况、农户生产经营情况等方面，在当地土地农业部门、农民学院大力协助下，从每个乡镇中随机选取 40~50 名农民发放“新型职业农民职业教育情况调查表”。本次调研共发放问卷 560 份，回收问卷 470 份，其中有效问卷 407 份。从样本的覆盖来看，调查范围涵盖了从一般农户到经营大户，涉及五个不同的农业产业。另外，课题组前往农民大学生创业基地、农业生产基地进行考察，进一步详细了解职业农民家庭农业生产经营情况，确保了数据的真实性和信息的客观性。

1. 样本的区域和产业分布情况。

样本涵盖了 3 个县区、11 个乡镇和 5 个产业类型，每个产业选择 2~3 个不同的乡镇进行调查，可以客观反映不同经济环境、农业产业下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的情况和农民需求意愿。样本选择结果如表 1 所示。

表 1 调查样本区域和产业分布情况

产业 区域	花卉苗木	水产	水果	蔬菜	休闲观光
南浔					
双林					
练市					
织里					
双林					
千金					
善琰					

和孚					
妙西					
埭溪					
道场					

2. 受访农民基本信息

表 2 反映了受访农民基本信息。被调查者呈现老龄化倾向，50 岁以上的占接受调查农民的 46.4%；家庭收入在 10 万元以内的农民占了受访农户的 64.9%；受教育程度集中在初中文化程度，占受访农民的 46.9%。参加合作社的受访农户中 85%都是一般社员；农业生产经营方式仍坚持家庭个体经营的占 65.48%。结合湖州农业生产中农民老龄化、低收入、受教育程度低、传统经营方式普遍的实际情况来看，问卷调查可反映出大多数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看法。在就业状况中，农业就业、务农兼打临工、务农兼副业三者大致相当，这与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村特征、浙江二三产业发展情况吻合。总体来讲，这些受访者的基本特征决定了其能客观地看待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成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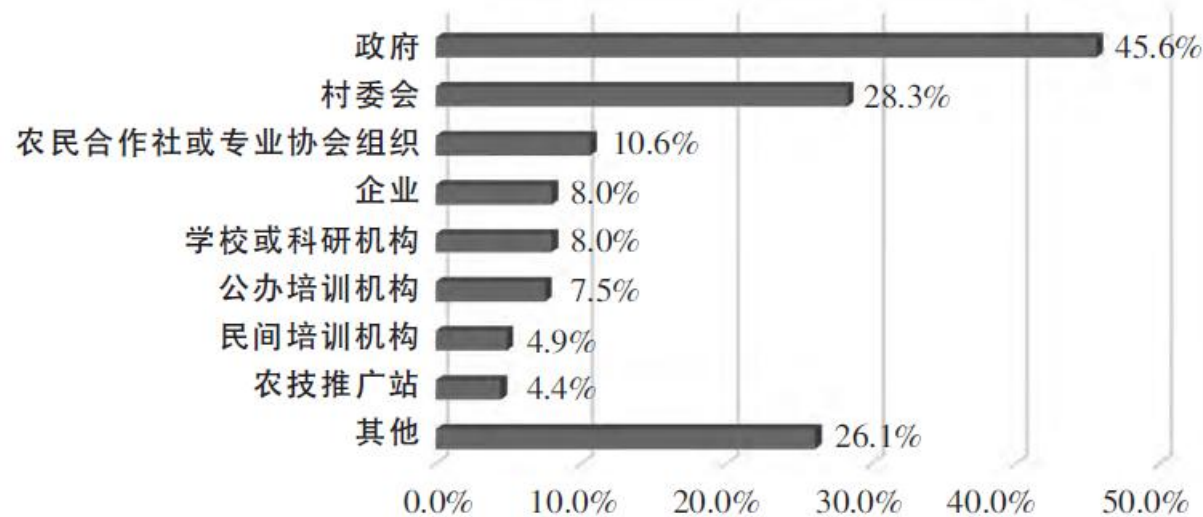
表 2 受访农户基本情况

变量	比重（%）	变量	比重（%）
年龄		社会角色	
40 岁以下	18.4	合作社管理人员	12
40-50	35.2	合作社行政人员	3
50 岁以上	46.4	一般社员	85
就业方式		受教育情况	
务农	27.7	小学及以下	19.2
务农兼打临工	22.4	初中	46.9
务农兼副业	23.5	高中（中专及职高）、大专	22.4
务工	11.2	大学本科以上	1.5
家庭收入分布		生产方式	
10 万元以下	64.9	个体经营	65.48
10 万~30 万元	28.0	合作社+农户	8.06
30 万~50 万元	3.9	企业+农户	3.55
50 万~100 万元	2.7	家庭农场	16.77
100 万元以上	0.5	其他	6.13

3. 湖州新型职业农民接受职业教育的情况

(1) 受访农民培训经历

在接受调查的 407 名新型职业农民中，有 227 人之前参加过其他单位组织的培训，占 55.8%。其中，45.6%的农民参加过政府组织的培训，28.3%的农民参加过村委会组织的培训，10.6%的农民参加过农民专业合作社或专业协会组织的培训，8.0%的农民参加过企业组织的培训，8.0%的农民参加过学校或科研机构组织的培训，7.5%的农民参加过公办培训机构组织的培训，4.9%的农民参加过民间培训机构组织的培训，4.4%的农民参加过农机推广站组织的培训。另外，参加除以上 8 个单位组织以外培训的农民占到 26.1%（见图二）。数据显示，组织培训的单位较多，农民有较多选择，培训的主导力量主要是地方政府和村委会，乡镇农技推广站、企业组织、专业合作社、学校、公办培训机构的培训作用尚未充分发挥。另外，选择“其他项”的农民的比例比较高，这一数据不能简单地理解为还有其他培训机构没有涉及，也可能说明农民对于培训组织单位并不了解。



图二 受访农民参加培训的情况

(2) 对其他教育培训的总体评价

对参加过其他教育或培训的农民，调查其对这些教育培训的评价，结果显示，56.0%的农民对所参加的培训表示“满意”，37.0%表示“比较满意”，3.2%表示“一般”，表示“不满意”的只有 3.8%。

(3) 获取湖州农民学院职业农民教育培训信息的方式或渠道

从获取湖州农民学院新型职业农民培训信息的方式或渠道来看，通过政府、村里宣传获取培训信息的农民所占比例较高，分别为 35.1%、65.6%。通过亲朋告知、互联网、电视、报纸了解培训信息的情况比较少，所占比例分别为 5.0%、0.9%、1.8%、1.2%，比例最小的是互联网，仅有 1.0%。综上所述，农民获取培训信息的方式或渠道较多。乡镇政府、村干部应鼓励农民积极参加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提高其从业技能。

4. 受访农户对接受职业教育的意愿情况

（1）培训意愿

问卷中对“如果有继续深造的机会，您愿意参加吗？”这一问题的调查，407 份样本中有 36.7%的农民表示无条件一定参加，63%的农民表示条件允许愿意参加培训，这说明农民具有较强的培训意愿。在一定条件下愿意参加的农民中，40.9%的农民表示有时间就参加，20.5%的农民表示免费就参加，1.6%的农民表示付费少就参加。总体上来看，金钱成本并不是农民是否参加培训的主要考虑因素，时间成本是农民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最大障碍。样本中有个别农民表示不愿意参加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占接受调查总数的 0.3%。这部分样本主要来自外出务工的农民，主要原因是缺乏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由于数量极少，不具有普遍代表性。

（2）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效果的认知

调查 407 名职业农民对参加湖州农民学院的农民职业教育后，能力是否得到提高或改善进行打分，按 5 分制计算，5=效果显著；4=效果较好；3=一般；2=效果差；1=没有效果，从能力提高的 13 个方面分别统计认知结果，调查结果如表 3 所示。

表 3 农民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效果的认知

内容	效果显著	效果较好	一般	效果差	没有效果
总体生产经营收入	42.8%	30.2%	24.9%	1.3%	0.8%
生产技能水平	25.2%	41.7%	32.0%	0.8%	0.3%
生产机械化水平	24.7%	35.3%	33.7%	2.3%	4.0%
经营管理能力	30.8%	40.6%	26.5%	1.3%	0.8%
产品营销能力	23.3%	41.7%	31.3%	1.6%	2.1%
产品品牌意识	34.1%	34.3%	27.4%	2.1%	2.1%
信息技术使用能力	29.4%	35.4%	30.2%	2.6%	2.4%
科技创新能力	29.4%	39.8%	26.5%	1.9%	2.4%
带动周边致富能力	25.7%	37.6%	29.0%	2.4%	5.3%
政策了解程度	33.0%	38.8%	24.8%	2.4%	1.0%
法律意识	33.0%	37.7%	24.9%	2.6%	1.8%
环境保护意识	40.2%	40.2%	18.3%	0.8%	0.5%
个人整体综合能力	29.3%	45.2%	23.1%	1.3%	1.1%

（三）指标评价体系构建

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涉及农民资源占有水平和能力提升，关系到农户的利益得失。农户是培训的对象和参与者，农户对培育工作的支持与推动是其成功的关键。只有为大多数农户认可关心、得到农户一致性支持和积极参与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模式，才是有效的制度创新。从这个角度出发，将农户满意度作为衡量新型职业农民湖州模式是否有效的一个标准，在此基础上，通过分析湖州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中哪些因素会影响农户满意度，可以间接地得出哪些因素会影响到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从而验证前文提出的理论假说。

在农户满意度指标的构建中，在问卷调查中设计了“您对参加湖州农民学院的职业农民教育的满意程度”，共设计了五个选项：很满意、比较满意、一般、不太满意、不满意，用这个数据来衡量农户满意度，作为指标体系中的因变量。调查中，反映“很满意”和“比较满意”的农户人数占到了91.61%，认为“一般”的有5.49%，认为“不太满意”的仅占2.9%，这说明农户对湖州农民学院的职业农民教育的满意度比较高。此外，66.34%的受访农民表示培训之后，农业经营收入有所增加；33.00%的农民认为收入没有变化；不足1%的农民表示培训后收入有所减少。这些数据也进一步证明了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是受到农民拥护与认可的。在进行数据统计时，将五个维度的选项，转换为二维，将“很满意”和“比较满意”的归为“满意”，将选择“一般”“不太满意”“不满意”的归为“不满意”，可发现表示“满意”的占91.61%，表示“不满意”的仅占8.39%。

在解释变量选取上，按照此前对影响因素的三个方面的分析，根据湖州农民学院新型职业农民教育的具体情况，结合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典型特质，综合考虑指标的可获得性，这里选取了相应的14个衡量指标（见表4）。

表4 指标选取及变量说明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调查问题	变量赋值
因变量		Y	农民对湖州农民学院的职业农民教育的满意程度	0=不满意；1=满意
教育环境	教育资源供给	X ₁	是否参加其他单位或组织举办的农民教育或培训	0=否；1=是
	其他教育培训的参与经历	X ₂	过去1年一共参加过几次其他农民培训或教育	1=没有参加过；2=3次以下；3=3~5次；4=5~10次；5=10次以上
	其他教育培训的评价	X ₃	对其他农民培训或教育的评价	5=很满意；4=比较满意；3=一般；2=不太满意；1=不满意
	政府宣传	X ₄	从何种渠道得知湖州农民学院可以参加职业农民教育	1=政府宣传；2=村里宣传；3=亲朋告知；4=互联网、电视、报纸；5=其他
行为角色	农户家庭总收入	X ₅	农户家庭总收入	1=10万元以下；2=10万~30万元；3=30万~50万元；4=50万~100万元；5=100万元以上
	受教育状况	X ₆	受教育状况	1=小学及以下；2=初中；3=高中（或中专、职高）、大专；4=本科及以上
	农民就业方式	X ₇	农民就业方式	1.务农；2.务农兼副业；3.务农兼务工；4.务工；
	教育培训中私人成本的价值	X ₈	如果有继续深造的机会，您愿意参加吗	1=付费少就参加；2=一定要参加；3=免费就参加；4=有时间就参加；5=不参加

	农户的社会角色	X_9	您在合作社中的工作是什么	1=管理人员: A. 社长, B. 副社长, C. 理事, D. 监事 长, E. 监事; 2=行政人员: A. 经理, B. 财会人员, C. 办公室人 员; 3=其他: A. 业务员, B. 技术员, C. 普通社员
	自身认知	X_{10}	参加湖州农民学院的农民 职业教育后,能力是否得到 提高或改善	5. 效果显著;4. 效果较好;3. 一般;2 效果差; 1. 没有效果
教育条件	对教育环境与 管理的满意度	$X_?$	对教育环境与管理的满意度	5. 很满意; 4. 比较满意; 3. 一般; 2. 不太满意; 1. 不满意
	对教学安排的满意度	X_{12}	对教学安排的满意度	5. 很满意; 4. 比较满意;3. 一般;2. 不太满意;1. 不满意
	对师资质量的满意度	X_{13}	对师资质量的满意度	5. 很满意; 4. 比较满意; 3. 一般;2. 不太满意; 1. 不满意
	对教材资料的满意度	X_{14}	对教材资料的满意度	5. 很满意; 4. 比较满意; 3. 一般;2. 不太满意; 1. 不满意

本研究的假设前提是：农户的参与积极性和支持程度是农民对湖州农民学院培训满意的先决条件，农户参与积极性和支持程度与农户对湖州农民学院进行职业农民培训的满意度成正相关。

（四）模型选择及说明

本研究所采用的数据主要是分类数据，采用概率模型分析离散选择问题是较理想的估计方法。设定的因变量“职业农民教育满意程度”分为“不满意”和“满意”的二分类变量，据此可建立二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该模型中，因变量 y 为职业农民教育满意程度，“ $y=0$ ”表示不满意，“ $y=1$ ”表示满意。

Logistic 回归模型是基于 logistic 分布函数而构建的。logistic 分布函数为：

$$f(y)=p^y (1-p)^y \quad (1)$$

Logistic 回归模型的基本形式为：

$$P_i=F(\alpha+\sum_{j=1}^n \beta_j X_j)=\frac{1}{1+e^{-(\alpha+\sum_{j=1}^n \beta_j X_j)}} \quad (2)$$

对公式（2）进行对数化处理，则线性化 Logistic 模型的数学表达形式为：

$$\text{logit}(p)=\ln\left(\frac{p}{1-p}\right)=\alpha+\sum_{j=1}^n \beta_j X_j \quad (3)$$

其中 p 为被解释变量，表示职业农民教育满意的概率； X_j 为解释变量，表示影响职业农民教育满意度的影响因素； α 为常数项； β_j 为回归系数。

上述各式构成了二元有序 Logit 模型。通过考察解释变量与对数发生比的关系，可以考察其与因变量（农户满意度）变化的概率关系。当一个解释变量的作用增加了农户满意度变化的发生概率，即表明其中内含着相互作用关系。

五、模型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模型的估计

运用 stata 12.1 软件对样本数据进行多项有序 logistics 回归分析处理。拟合优度及相关检验值表现较为稳定且显著（见表 5）。

表 5 职业农业教育满意程度影响因素的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

自变量	标准回归系数	标准误	Wald 值	Sig.值	Exp (B)
X_1	-0.4471	0.5337	0.7020	0.4021	0.6395
X_2	-0.3299	0.4180	0.6230	0.4299	0.7190
X_3	0.4315**	0.1981	4.7435	0.0294	1.5396
X_4	0.4992	0.3361	2.2059	0.1375	1.6474
X_5	-0.0236	0.2602	0.0082	0.9278	0.9767
X_6	0.7027**	0.3298	4.5416	0.0331	2.0193
X_7	-0.1881	0.1987	0.8966	0.3437	0.8285
X_8	0.4301	0.2691	2.5540	0.1100	1.5374
X_9	0.0651	0.3538	0.0339	0.8540	1.0673
X_{10}	0.5314**	0.2607	4.1554	0.0415	1.7014
X_{11}	0.2698	0.4730	0.3254	0.5684	1.3097
X_{12}	0.3344	0.4813	0.4827	0.4872	1.3970
X_{13}	1.8490*	0.5632	10.7764	0.0010	6.3533
X_{14}	0.5586	0.3274	2.9120	0.0879	1.7483
常数项	-16.6264	3.2569	26.0604	0.0000	0.0000

注：*、** 分别表示达到 1%和 5%的显著性水平。

可以看出，只有 X_3 、 X_6 、 X_{10} 、 X_{13} 通过 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即农民对其他教育培训的评价、农户受教育状况、农户对培育收益的预期判断、对师资质量的满意度等变量对农户满意度具有显著的影响，这四个因素分别涉及教育环境、行为人角色特征、教育条件三大类指标，与前文的理论假设相符。但是在教育环境指标中 X_1 、 X_2 、 X_4 变量，行为人角色中的 X_5 、 X_7 、 X_8 、 X_9 变量，教育条件指标中的 X_{11} 、 X_{12} 、 X_{14} 变量，未能够通过显著性水平的检验，这与前文预期假设不相符。

（二）结果分析

1. 教育环境特征对职业农民教育满意程度的影响

首先，对参与过的教育培训的评价对湖州学院组织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的满意度成正相关。这表明农民对过往参加过的其他形式的教育培训的评价越高，对湖州学院的培训的满意度越高。通过对湖州地区的调查，可能的解释在于：第一，农民存在学习积极性。在受访的农户中，之前参加过政府举办的培训的占 55.8%，对剩余 44.2% 未参加其他教育或培训的农民进行调查，发现 35.9% 的农民认为自身没有时间参加培训，36.1% 的农民认为当地没有组织，34.5% 的农民认为没有信息来源，不知道培训信息。少部分农民认为费用太高或其他原因，所占比例分别为 0.8%、4.2%。不知道培训信息、没有组织是农民未接受培训的主要客观原因。可见农民是存在主观的学习积极性的，并且已经有一半以上的农民接受过其他形式的教育培训。第二，对这些教育培训的较高满意度会形成农民对同类培训“有用性”的普遍认知或对培训功用的既有认识，继而继续参加有组织的教育培训，并继续形成较高的满意度。第三，如果农民对其他教育培训的评价较低且存在学习积极性，就会存在较高的培训期望或者存在未满足的培训需求，带着这种需求，会继续参加培训，农民对湖州农民学院的培训的要求会比较高，满意度也会较不容易满足，除非湖州农民学院能够提供较之其他培训更优质的内容。

其次，教育资源供给和其他教育培训的参与经历对农民参加职业农民培育满意度的影响不显著。可能的解释在于：第一，其他培训影响农民参与积极性的条件不具备：一是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是国家的人才培育工程，每年农业部、财政部制订培育方针，地方制订培训计划，在这种指标控制下，农民参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具有行政动员和行政组织的性质，与其他类型的培训项目在性质上不同。二是由于已有的各类培训存在分散性、数量少、缺乏政策扶持、提升效果不明显等问题，已经参加过培训的农民尚不能对未参加的农民形成教育缺乏的焦虑感。第二，在湖州市调查发现农民参加的其他教育培训主要以电大教育和各类人才工程为主，这些培训项目不能削弱或增强农民继续参加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训的积极性，也就是说，农民存在培训需求，而这种培训需求不直接导致较高或较低的满意度。最后，政府宣传对农民参加职业农民培育满意度的影响不显著。湖州市的新型职业农民是湖州农民学院承接由区县教学点和乡镇成校对接的培育模式，农民获得培训信息及其教学管理都是由有关行政部门负责的，因此，大多数农民都是接到政府宣传后报名参加的，甚至很多农民不知道湖州农民学院。在大家信息获取基本一致的情况下，存在满意和不满意的分歧，表明政府宣传会形成群众动员力和行为导向性，刺激农民参与积极性，并且政府的官方权威会增加培训项目的正规性、有效性、保障性，进而增加农民对培训效果的潜在向好预期。政府宣传越广泛，农民对湖州农民学院培训越积极参与，并且评价越高。

2. 农民个体特征对职业农民教育满意程度的影响

首先，农民的受教育状况与其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的满意度成正相关。湖州市现代农业发展程度较高，出现很多规模经营、创业成功的案例，并且积极探索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绿色循环农业等新型经营模式。这些农民的成功与在农民学院进行再教育和农民学院提供的专家平台、政策扶持机会有密切的关系。从对课堂听课情况的观察来看，规模经营主体学习认真、有较高的学习热情和主动请教的愿望，对培训内容的吸收和接纳程度较好，较容易产生正面评价。

其次，农民的认识和预期收益判断与农户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的满意度成正相关。通过对农民培训后生产经营收入、生产技能水平、机械化水平、经营管理能力、产品营销能力等方面能力提升的程度打分情况来看，农户对培训效果的认知或预期判断较好。预期收益判断不仅会增加成本投入，而且会影响对培训的评价。这也是培训的最终目的，农民的预期判断越好，对培训的满意度也会越高。

再次，农民收入水平、农民就业方式、社会角色对农民参加职业农民培育满意度的影响不显著。主要原因在于：第一，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是一个自上而下贯彻的具有政策性动员性质的国家工程项目，湖州各区县制订的培育指标和各教学点统计的学习内容都是建立在农民实际需求的基础之上的，针对的主要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因此，课题组对已经参加新型职业农民培

训的农民的调查，不能区别参与积极性的高低。第二，农民收入水平存在地区普遍性，农民家庭总收入 10 万元以下的新型职业农民所占比例达 64.9%，家庭收入 50 万~100 万元、100 万元以上的新型职业农民，占比分别为 2.7%、0.5%，而调查显示农民的满意度达到 90%以上，可见农民满意度不受收入水平的影响。第三，就业方式和收入水平只会影响农民的参与积极性，参与积极性高的农民不一定会产生较高的满意度。

最后，农户私人成本价值对农民参加职业农民培育满意度的影响不显著。主要原因是受到国家财政资金的支持，湖州新型职业农民培训不需要农民承担学费，并且农民可以获得听课补贴；农民学院的开班方式采取“就近听课、遵循农业生产时间”的原则，课堂开设在乡镇，农民的交通成本较低；在时间安排上选择在农业生产淡季集中授课，总学时在 15 天左右，每天的学习时间为 2~4 小时，不争抢农民基本的生产时间。因此，当地农民存在较低的私人成本。此外，在调查中，57.3%的农民表示是否收费不影响农民的培训意愿。

3. 教育条件对职业农民教育满意程度的影响

对师资质量的满意度与农户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的满意度成正相关。师资质量直接影响教学内容和教学效果：专家的权威性和素质直接关系农民对培训水准的评价和农民知识的获得感、时间花费的值得感；所学的内容质量影响农民学习目标的达成；对教学纪律的严格管理可以增加农民违反纪律的成本，形成认真的教学氛围。湖州农民学院建立了一支由浙江大学、湖州市农机推广人员、湖州职业技术学院教学研究人员、乡镇农机推广员组成的“省市校乡、农科教技”四合一的专家教师队伍；在管理方面，各教学点采取湖州农民学院老师蹲点负责制，对学员统一发放学员证，要求携带学员证进课堂听课。教学师资及其素质可以增加农民的满意度。

对教育环境与管理的满意度、对教学安排的满意度、对教材资料的满意度这三个指标对农民参加职业农民培育满意度的影响不显著。其中，对教材资料的满意度这一指标的不显著和之前的假设相符。在具体的教学环节，农民比较注重软实力，对硬件安排不太关注。农民培训可以采用灵活的教学方式，湖州市充分利用乡镇成校的教育平台就是很好的举措。

六、湖州“农民学院模式”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策略

第一，以“乡村振兴战略”为统领，制订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指标体系。根据党的十九大报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部署，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将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作为区域发展的重要内容，创新培育体系，出台支持政策。围绕“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的要求，细化地方的发展目标和特色项目，结合产业发展和规模经营的现代化人才素质要求，制订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素质指标体系。

第二，以实施重大教育培训项目为抓手，加大职业农民培育力度。持续抓好“生产经营型、专业技能型、社会服务型”新型职业农民初级培育工作，试点拓展中级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对已经取得资质的新型职业农民启动后续教育。启动实施现代青年农场主培养计划。加强青年农场主培训项目的对接与策划，组织家庭农场主外出学习考察，着力提高青年农场主创新创业能力。做优做强专题研修班项目。办好农家乐经营管理、蜜蜂养殖技术、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管理高级研修班和农村电子商务等系列专题研修班。探索新型职业农民“高、中、初”三级资质认定机制，打通新型职业农民层级晋升的有关通道，探索形成新型职业农民扶持政策体系，强化新型职业农民动态管理。^[19]全面推进教育培训项目改革，抓实“高级研修班”与“农民创业大讲堂”等特色培训项目，打造农村电子商务、休闲观光农业、青年农场主等教育培训平台。

第三，以农民需求为导向，着力提升农民职业教育精准性。加强培训需求调查，根据教育培训对象的不同层次和产业特点，分类制订培训方案，实施精准培训。全面推进课堂教学改革，根据农民学习特点、专业性质和课程特征，创新课堂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推进小班化教学。制订完善初、中、高级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标准、课程体系，按照精细培训、因需施教的原则，分产业、分专业、分层次、分类别科学选择培训内容，立足产业发展中心，以技术、管理、创业为主线，完善符合农

业生产规律和农民学习特点的“分段式、参与式、菜单式”培训形式。

第四，以加强培训平台建设为抓手，着力提升农民职业教育质量。强化培训过程的教学组织、管理与服务，探索建立以职业农民基础数据为支撑的培训认定服务管理平台，实现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智慧化管理。全面推进教学改革，推进实训基地建设，选编优秀案例，推行实践导向型教学模式，推行“赛教结合”教学模式，探索举办职业技能大赛。打造培训基地平台，建立新型职业农民教学实践基地，规范“田间课堂”建设，实行“专家辅导+电化教育+示范基地”的实践教学模式，把更多接地气的专家教授请到“田间课堂”授课，规范建好一批“固定课堂”“空中课堂”“流动课堂”“田间课堂”。加强农民职业教育信息化建设，顺应“互联网+教育”发展趋势，加强信息化建设，建好“云教室”、移动学习端，搭建基于微信公众号的“掌上农民学院”学习平台，注重农业技术类微课程资源建设，不断充实“微课超市”。

第五，积极创建良好的培育环境。一是加强培育新型职业农民重要意义的宣传，加强农民科技教育培训政策举措、经验做法和典型事迹的宣传，充分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调动农民参加教育培训的积极性。二是各级政府要聚力打造发展平台，开展涉农项目招商，全方位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和施展搭建平台，创造他们“在参与中提高、在企业中培育、在产业链中成长、在市场体系中成熟”的良好环境。Reform

参考文献：

沈红梅霍有光张国献：《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机制研究——基于农业现代化视阈》，《现代经济探讨》2014年第1期，第65～69页

[2]郝志瑞：《基于国际经验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创新路径研究》，《世界农业》2015年第12期，第232～236页

[3]黎家远：《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中的财政支持问题研究——以四川省为例》，《农村经济》2015年第5期，第113～117页

[4]金绍荣肖前玲：《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地方政府的角色、困境及出路》，《探索》2015年第3期，第108～112页

[5]李红：《日本农民职业化教育对策分析及启示》，《中国农业教育》2008年第2期，第14～16页

[6]“农民的培训需求及培训模式”课题组：《农民的培训需求及培训模式研究（总报告）》，《经济研究参考》2005年第35期，第2～27页

[7]叶俊焘米松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理论阐释、他国经验与创新路径——基于农民现代化视角》，《江西社会科学》2014年第4期，第199～204页

[8]倪慧万宝方龚春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国际经验及中国实践研究》，《世界农业》2013年第3期，第134～137页

[9]李国祥杨正周：《美国培养新型职业农民政策及启示》，《农业经济问题》2013年第5期，第93～97页

[10]胡林招：《新型职业农民培育问题研究》，《广东农业科学》2014年第7期，第233～236页

[11]朱起臻文静超：《论新型职业农民及其培育》，《农业工程》2012年第3期，第1～4页

[12]胡小平李伟：《农村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新型职业农民培育问题研究》，《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 年第 5 期，第 57～62 页

[13]童洁李宏伟屈锡华：《我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方向与支持体系构建》，《财经问题研究》2015 年第 4 期，第 91～96 页

[14]王辉刘冬：《美国农业职业教育与培训的经验与启示》，《人力资源开发》2014 年第 1 期，第 80～83 页

[15]李小红：《农民专业合作社参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研究》，《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 年第 9 期，第 898～901 页

[16]陈蓓蕾童举希：《地方政府促进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思路与对策》，《贵州农业科学》2013 年第 6 期，第 249～251 页

[17]Todaro M. . Internet Migr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 Review of Theory, Evidence, Methodology, and Research Priorities, 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 Geneva, 1976.

[18]Arthur J. A. . Interregional Migration of Labor in Ghana, West Africa: Determinants, Consequences and Policy Intervention. Review of Black Political Economy Fall, 1991: pp.89～103.

[19]谭银清王钊陈益芳：《受教育程度对我国农民收入来源和结构的影响》，《西部论坛》2014 年第 4 期，第 9～15 页